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刘金典*

内容提要 基于 2016—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夏普利分解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并通过分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 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仅次于收入和健康, 贡献率高于 10%; 超时劳动挤出了农民工的教育和娱乐投资, 降低了其市民化融入水平, 导致该群体幸福感的恶化。此外, 收入提升削弱了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教育程度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效应。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异质性。因此, 缓解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超时劳动 农民工 幸福感 市民化 生活满意度

一 引言

幸福感是人类经济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 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致力于获得幸福(卢海阳等, 2017)。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终极追求在于增进人民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探讨幸福感的决定因素颇具现实意义(万广华、张彤进, 2021)。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

* 刘金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 kimjeonleo@126.com。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效应分析”(245202106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农户贫困根源及其内在机理研究”(7187309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劳动力流动视角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21&ZD077)的资助。

移，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换到非农产业。2021年，中国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从年龄构成来看，农民工群体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①。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着最脏、最累、最苦的职业，为流入地的城市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情况、生活状况和幸福感应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然而，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护上处于弱势地位，超时劳动现象普遍存在^②。事实上，因户籍制度的长期实施，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型劳动，存在劳动议价能力低、工作强度高、劳动时间长、工作稳定性低、工资福利待遇不高的典型特征。为了获得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农民工被迫或主动选择超时劳动的现象十分普遍。企业也并未严格执行工时制度，加剧了农民工牺牲休息时间换取工资报酬的现象。无论是从日工时还是从周工时来看，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均十分严重。超时劳动严重侵犯农民工的休息、休假、安全生产及健康生活等合法权益，对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刘璐宁、孟续铎，2018；罗俊峰、童玉芬，2016）。

法定工时制度旨在通过平衡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使得附着在劳动力之上的人力资本得以恢复和发展。超时劳动打破了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正向循环与可持续发展，透支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引发农民工职业倦怠、劳动效率下降、工作失误等问题，更严重的会引发工作事故、伤残乃至“过劳死”的发生。因此，超时劳动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精神生活和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农民工幸福感的下降，形成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与幸福感下降并存的“幸福悖论”。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将农民工视为宝贵的人力资源而非廉价劳动力，让农民工从“张弛无度”转向“张弛有度”，是破解农民工幸福感密码的必由之路。

尽管学术界认识到过度劳动会对个人健康、劳动生产率、劳资关系等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实证分析超时劳动福利效应的研究仍有待深化，且对福利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损失的评估方面（王欣、杨婧，2021），对超时劳动造成的幸福感等福利损失效应仍有待进一步估计。遗憾的是，采用最新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仍然匮乏。超时劳动对农民工

① 来自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参见 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9/content_5688043.htm。

② 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比达64.40%，周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比为78.40%。

幸福感的影响符合“损耗说”抑或“无关说”？超时劳动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教育年限是否调节超时劳动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式？如何从超时劳动和收入水平的交互效应角度解读“伊斯特林悖论”？因出生世代的不同、成长经历的差异及市场环境的变化，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在超时劳动与幸福感的关系上是否存在差异？以上问题都有待实证分析进行检验。

基于此，本文采用 2016 - 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上海市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并从超时劳动挤占教育及娱乐支出、影响城市化融入的角度揭示其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收入和教育对超时劳动影响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本文还将农民工划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对比分析超时劳动对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异质性。本研究为降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福利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城市化融入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二 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市场竞争加剧和逐利动机驱使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超时劳动现象愈发普遍。自 20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心理学、医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探讨超时劳动问题，对超时劳动的概念界定、测度方式、现状、成因、危害及政策规制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就出现了超时劳动现象，其负面影响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日本“过劳死”现象的频发，推动了关于过度劳动成因的实证研究，以及缓解过劳危害的政策研究（Bowles & Park, 2005）。关于中国超时劳动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对象多为知识型劳动者，如教师、医生、白领等群体（Huang et al., 2021; Xu et al., 2020）。中国农民工群体超时劳动问题普遍且严峻，已有研究集中在揭示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上，关于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福利效应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学者们一致认为农民工群体中存在普遍且严重的超时劳动现象。目前，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议题。一是旨在揭示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将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经济因素（如工资收入、加班报酬等）、职业因素（如所属行业、职业、工会、劳动合同签署等）、社会因素（如户籍制度、社会融入、身份认同、最低工资制度等）四大类（郭凤鸣，2020；孔庆洋等，2014；冷晨昕等，2021；刘璐宁、孟竣

铎, 2018; 谢勇、史晓晨, 2013; Zhan et al., 2020)。二是旨在探讨超时劳动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学者们对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形成了超时工作的“损耗论”和“无关论”两种竞争性的观点。“损耗论”认为, 超时劳动会损害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加剧“工作—生活”之间的冲突, 负向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程名望等, 2012; 王笑天等, 2017; Adkins & Premeaux, 2012)。过度劳动在生理上会加重疲劳感知, 催生吸烟、酗酒等风险行为, 引发疾病乃至猝死的发生, 在心理上会引发焦虑、职业倦怠等不良精神状况(孟续铎、王欣, 2014)。在“工作—生活”冲突上, 超时劳动打破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挤占劳动者用于社会交往、娱乐休闲、学习充电等业余活动的时间, 削弱劳动者所能获得的体力精力恢复、社会心理支持和自身发展需求。“损耗论”关于超时劳动线性负向影响幸福感的观点受到“无关论”的挑战。“无关论”认为超时劳动和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即便存在也仅是较为微弱的关系。缩短工作时间也未如预期般提升劳动者的幸福感(Ng & Feldman, 2008)。

但以上研究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 并没有特定于分析农民工群体超时劳动的幸福效应。事实上, 农民工在教育人力资本方面低于城市户籍人员。城市内部存在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 农民工因人力资本偏低和户籍限制因素, 往往被排除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 大部分就职于城市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 导致其劳动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薄弱, 面临工作层次低、稳定性差、任务繁重、社会保障缺失、收入水平不高的困境(王桂新、胡健, 2015)。因此, 超长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负荷、机械重复的工作内容以及缺位的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构成显著的损耗效应, 超时劳动对于农民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更符合“损耗论”假说。相关研究也表明, 农民工高强度和超负荷的工作、单调的业余生活、匮乏的经济收入、偏低的城市化融合和身份认同的不安, 侵蚀着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 引发农民工的心理不安、精神焦虑、孤独感和无助感(程名望等, 2012; 董延芳等, 2018)。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 因农民工工作性质和内容的特殊性,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造成身心的双重损耗, 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

农民工迫于生计进城务工, 首要目标是提升家庭经济收入和改善生活状况。只要加班时间能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农民工甚至会主动牺牲闲暇时间, 用超时劳动换取额外的收入。超时劳动挤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必要时间, 不利于其知识积累和技能水平的提升, 导致其锁定在当前低技能和低工资水平的工作岗位, 难以

获得工资水平上涨和职位晋升。超时劳动压缩了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挤出其休闲娱乐时间，降低其城市生活融入水平。看电视、玩手机、打牌、喝酒等成为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方式，业余生活简单而单调（程名望等，2012）。本文据此提出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个影响机制（假说2）。

假说2：超时劳动通过降低农民工的教育及娱乐支出间接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

农民工虽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受制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难以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导致该群体在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方面享受与户籍人口差别化的待遇。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远离家人朋友只身一人前往城市打工，在农忙季节或节假日“候鸟式”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单飞”的农民工失去原生社会关系网络提供的情感支持，对所在城市又难以形成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亟待构建补偿型的社交网络来弥补社会隔离产生的孤独感和焦虑情绪（钱文荣、张黎莉，2009）。

然而，超时劳动挤压了农民工维持原生社交网络 and 在工作城市构建社交网络的时间，导致其在城市中难以建立起关系网络和情感纽带，从而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超时劳动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加重了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隔离感。在身份认同上，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城市于他们而言只是暂时栖身的“停留站”，虽然可以获得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但最终他们还是要离开城市回到家乡这个“终点站”。综上，超时劳动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也削弱了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感和城市化融入水平，加重了农民工群体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从而降低该群体的幸福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3：超时劳动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水平间接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和入户面访方式，全面收集来沪工作农民工及随迁家属的基本情况，涉及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健康医疗、居住生活、社会融合等基本情况，特别是详细调研了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和生活满意度状况，可以为研究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撑。

（二）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模型设定如下：

$$Swb_{ij} = \beta_0 + \beta_1 \times Workden_{ij} + \theta \times Controls_{ij} + Y_i + \varepsilon_{ij} \quad (1)$$

式（1）中， Swb_{ij} 表示第*i*年第*j*个农民工的幸福感综合指标，采用熵权法将农民工的健康、工作、收入及生活满意度凝结为一个综合指标，取值为0~100之间的连续变量。 $Workden_{ij}$ 衡量农民工超时劳动强度，采用周工作时间与法定周标准工作时间（44小时）的比值得到。 $Controls_{ij}$ 为一组可能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的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融合特征两类因素。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Age*）、年龄的平方项（*Agesq*）、性别（*Gender*）、民族（*Race*）、健康状况（*Health*）等变量。社会融合特征主要引入户籍歧视（*Discrim*）变量，反映农民工在城市找工作时是否受到户籍限制。同时，为控制宏观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引入时期固定效应 Y_i ，以进一步控制时期因素的影响。

（三）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旨在研究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幸福感是感兴趣的结果变量。对幸福感的探讨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然而至今幸福感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测度方法。尽管幸福感难以言说和精确定义，但幸福感能被个体真切感知。抽象地说，幸福就是个体对自身状况或生活的满意感。学术界通常采用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评价幸福程度。如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就通过询问“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来评估个体的幸福感程度。这种测度方法简单易操作，且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和有效性，能够真实地反映个人的幸福体验（Easterlin, 2003）。国内学者对幸福感的衡量主要有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种方法。如程名望和华汉阳（2020）采用主观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感的代理变量，以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反映幸福感的高低。但有学者指出，幸福感应该是主体对自身多维度状况的综合评价，仅采用单一维度衡量具有片面性和波动性，无法给出幸福感的完整描述（Dolan et al., 2008）。因此，有学者采用综合性指标测度幸福感的高低，如祝瑜晗和吕光明（2020）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层面衡量幸福感。

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综合指标法，从健康、工作、收入和生活满意度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农民工的幸福感。多指标综合评价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之分。主观赋权法因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臆断性而饱受质疑和诟病。熵权法是客观赋权法的一种，该方法能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

提高幸福感综合指标的可信度和精确度,同时能降低主观赋权法在权重赋值上存在的主观性(陈景华等,2020;杨丽、孙之淳,2015)。因此,本文采用熵权法将四个维度的满意度指标凝结为幸福感综合指标(取值介于0~1之间),并将该指标放大100倍,最终形成的幸福感指标界于0~100之间,值越大则幸福感越高^①。

2. 核心解释变量

超时劳动为核心解释变量。尽管学者对超时劳动的界定并不统一,但大都将劳动时间识别为超时劳动的重要维度(郭凤鸣、张世伟,2020;王静、王欣,2013)。遵循研究惯例,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指农民工在超出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付出的额外劳动。实证分析中,学者常将超时劳动处理成二分变量,如依据农民工日工作时间是否超过8小时,或周工作是否超过44小时,将农民工分为超时劳动组和正常劳动组。二分法能反映农民工是否超时劳动,但损失了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强度信息。为衡量农民工超时劳动的严重程度,引入超时劳动强度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农民工实际工作时间与法定工作时间之比,以测度农民工超负荷工作的严重程度。具体来说,以农民工周劳动时间与法定周劳动时间(44小时)的比值测度超时劳动强度。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并更好地与已有研究形成对照,引入农民工超时劳动层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具体来说,将农民工周工作时间在44小时及以下、45~50小时、51~60小时以及61小时及以上分别定义为适度劳动、轻度超时劳动、中度超时劳动、重度超时劳动,分别赋值为1~4。需要指出的是,该变量属于典型的有序变量,回归分析中以适度劳动作为基准组。

3. 控制变量

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讨,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考察。从微观层面来看,学者们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归结为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就业状况等(袁方、史清华,2013;Easterlin,1974;Frey & Stutzer,2002)。性别、年龄、民族、健康状况等人口统计特征也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程名望、华汉阳,2020;卢海阳等,2017)。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增长(刘军强等,2012)、通货膨胀(陈刚,2013)、环境污染(黄永明、何凌云,2013)、社会信任(袁正、夏波,2012)等也被识别为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为更加准确地估计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① 熵权法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其次采用熵值法对四个满意度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系数;最后通过加总各指标的权重与标准化值的乘积得到个体的幸福感综合指标。

借鉴已有研究（方聪龙、芮正云，2018），本文设置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收入水平（*Income*）、年龄（*Age*）、年龄的平方（*Agesq*）、性别（*Gender*）、民族（*Race*）、婚姻状况（*Marriage*）、健康状况（*Health*）、教育年限（*Eduy*）和户籍歧视（*Discrim*）等。其中，对收入水平做对数化处理，引入年龄及其平方项能够考察年龄对幸福感的非线性影响。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见表1。

表1 变量设置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i>Sub</i>	幸福感	65.1636	14.7353	12.3572	100.0000
解释变量	<i>Workden</i>	超时劳动强度	1.2143	0.3266	0.0227	2.5455
	<i>Overwork</i>	超时劳动层次	2.3643	1.1858	1	4
控制变量	<i>Income</i>	收入的对数值（缩尾处理）	8.4819	0.3153	8.0064	8.9872
	<i>Age</i>	年龄	37.2737	10.4122	17	69
	<i>Agesq</i>	年龄的平方	1497.7103	820.2123	289	4761
	<i>Gender</i>	性别（男=1，女=0）	0.6173	0.4861	0	1
	<i>Race</i>	民族（汉族=1，其他少数民族=0）	0.9854	0.1199	0	1
	<i>Marriage</i>	婚姻状况（有配偶=1，其他=0）	0.7744	0.4180	0	1
	<i>Health</i>	健康状况（健康=1，其他=0）	0.9819	0.1332	0	1
	<i>Eduy</i>	教育年限	10.6543	3.3268	0	19
	<i>Discrim</i>	户籍歧视（遭遇歧视=1，其他=0）	0.1250	0.3308	0	1
中介变量	<i>Eduexp</i>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对数）	0.8265	1.0373	-5.0969	4.2086
	<i>Urbanization</i>	城市化融入	18.7860	27.8386	0	100

注：样本总量为3431人，2016年、2017年、2018年的样本量分别为1136人、1148人、1147人；*Eduy*为受教育年限，“未受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对应的受教育年限依次为0、6、9、12、15、16、19；*Eduexp*为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放大100倍后的对数值；城市化融入（*Urbanization*）为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综合指标，涵盖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度（*Adaption*）、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和留城意愿（*Urban*）三个分指标，并通过熵权法处理得到，取值介于0~100之间，值越大城市化融入水平越高。

资料来源：根据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农民工劳动强度的分布情况，并分劳动强度计算了农民工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分析可见，适度劳动的农民工占比为1/3左右（34.07%），超时劳动的农民工占比接近2/3（65.93%）。中度和重度超时劳动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21.25%和24.63%，农民工超时劳动现象普遍且严重。超时劳动剥夺了农民工群体正常的休息休

假权,挤压了该群体休闲娱乐时间,侵蚀该群体的身心健康,引发焦虑感和疲惫感,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及幸福感体验。随着超时劳动强度的上升,农民工的幸福感从适度劳动的 67.38 下降到了重度超时劳动的 63.15。分析超时劳动强度与幸福感的变动趋势可见,二者存在反向变动的趋势。但以上分析只是平均水平的相关性检验,并没有控制一系列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因此,无法给出劳动强度对幸福感的因果影响。下文将采用实证方法对二者关系做出更严谨的检验。

表 2 农民工超时劳动情况统计表

劳动强度	样本数	样本占比(%)	幸福感(均值)
适度劳动	1169	34.07	67.38
轻度超时劳动	688	20.05	65.34
中度超时劳动	729	21.25	63.77
重度超时劳动	845	24.63	63.15

注:分别定义农民工周工作时间在 44 小时及以下、45~50 小时、51~60 小时、61 小时及以上为适度劳动、轻度超时劳动、中度超时劳动、重度超时劳动,分别赋值为 1~4。

资料来源:根据 2016-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式(1)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1)汇报了全样本估计结果。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交乘项:超时劳动与收入水平的交乘项($Workden * Income$)、超时劳动与教育年限的交乘项($Workden * Eduy$),以分析收入水平和教育年限对超时劳动与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3)和模型(4)汇报了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子样本的估计结果。

模型(1)的实证结果表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超时劳动强度每上升 1 单位会使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5.8495 个单位。以上结果初步证实假说 1,即超时劳动损害农民工的幸福感,这符合“损耗论”的预期。分析加入交乘项的模型(2)可知,收入水平负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教育年限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如果农民工能够自主选择劳动时间,并且超出标准工作时间的超时劳动能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加班工资是标准工资的 1.5 倍)获取合理的经济补偿,那么超

时劳动将会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进而弥补超时劳动所带来的负累感。但农民工受到技能和流动性的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合理的休息休假、超时劳动的经济补偿权均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导致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如郭凤鸣和张世伟（2020）研究指出，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延长导致其小时工资的下降，超时劳动并未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甚至低于标准工资水平^①，农民工超时劳动更多是迫于工作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表 3 超时劳动强度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因变量：幸福感			
	(1)	(2)	(3)	(4)
	全样本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超时劳动强度	-5.8495 *** (0.7502)	-51.9755 *** (17.8070)	-3.6265 *** (0.9788)	-8.9805 *** (1.1733)
收入	13.4481 *** (0.8438)	5.4741 * (2.8819)	13.8605 *** (1.1690)	12.8391 *** (1.2342)
年龄	-0.6401 *** (0.1928)	-0.6396 *** (0.1937)	-2.6843 *** (0.7596)	-0.1906 (0.8153)
年龄的平方	0.0080 *** (0.0024)	0.0080 *** (0.0024)	0.0292 *** (0.0078)	0.0031 (0.0139)
性别	1.1139 ** (0.5131)	1.3362 ** (0.5204)	-0.2874 (0.7740)	2.3013 *** (0.6803)
民族	3.1297 (2.0033)	2.8451 (1.9777)	4.1379 (3.3567)	2.4735 (2.5131)
婚姻状况	2.2070 *** (0.6824)	2.2911 *** (0.6815)	2.1216 (1.3650)	1.5724 * (0.8156)
健康状况	14.8986 *** (1.9284)	14.6080 *** (1.9200)	14.0193 *** (2.2053)	16.5747 *** (3.9665)
教育年限	-0.0197 (0.0888)	0.8570 *** (0.3105)	0.0399 (0.1304)	-0.2118 * (0.1278)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续表

	因变量：幸福感			
	(1)	(2)	(3)	(4)
	全样本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户籍歧视	-5.1130 *** (0.7043)	-4.9605 *** (0.7064)	-5.1720 *** (0.9792)	-4.8832 *** (1.0174)
超时劳动 强度 * 收入		6.3329 *** (2.1717)		
超时劳动 强度 * 教育年限		-0.7411 *** (0.2595)		
常数项	-49.1967 *** (7.9070)	9.6285 (23.6752)	-6.9466 (21.6773)	-47.9421 *** (14.7618)
调整后 R ²	0.1421	0.1449	0.1509	0.1401
F	54.5851	47.1749	28.5004	29.4101
样本量	3431	3431	1597	1834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将出生于 1980 年以前的受访者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将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 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分析模型 (3) 和模型 (4) 的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结果可知，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超时劳动状态时，均会经历幸福感的下降。区别在于，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影响强度存在代际异质性。具体来看，超时劳动强度每上升 1 单位，分别引发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3.6265 单位和 8.9805 单位。新生代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幸福感受损是老一代农民工的 2.48 倍。在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估计结果进行似不相关回归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 估计后，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超时劳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比老一代高出 5.3540 单位，且二者差异的卡方检验统计量为 12.35，通过 0.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超时劳动造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福利损失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超时劳动对不同世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强度的异质性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老一代农民工是第一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具有浓厚的家庭责任感和乡土观念，受制于较低的教育水平，他们多在建筑行业就业，行业特征决定了他们工作时长、劳动强度大，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和强烈的家庭责任意识，塑造了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性情，导致他们对超时劳动的容忍度偏高。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有所提升，从事的职业更为多元，业余生活更为丰富，对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有了更高的诉求，对城市有更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类型、

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上的深层次转变，使得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业余休闲时间换取收入，对超时劳动更为敏感。

回归分析反映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边际影响，但并不能回答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率。夏普利分解方法（Shapley Decomposition）能测度各解释变量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比重，分解结果见表4。分析可见，对农民工幸福感贡献比例最高的四个因素分别是收入水平（*Income*）、健康状况（*Health*）、超时劳动强度（*Workden*）和户籍歧视（*Discrim*），贡献率分别为53.96%、14.02%、10.02%和9.48%。四个因素累计能解释农民工幸福感的87.48%，在破解农民工幸福感密码上占据主导地位。

收入水平是农民工幸福感的首位影响因素，这与以往研究一致。经济因素是促使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驱动力，物质生活改善、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源泉（冯永琦、张天舒，2016；Gao & Smyth，2011）。健康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度仅次于经济因素。农民工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且技能匮乏，在城市中拥有的社会资源比较少，多就职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福利待遇低是农民工就业的典型特征。城市融入过程中遭遇的就业压力、生活压力、歧视待遇和文化隔离加重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负担。农业户籍身份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在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上面临歧视性待遇，在遭遇失业、工伤、患病时，常会陷入艰难的处境。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对健康具有显著的损耗效应，而健康的损耗在城市难以得到有效的弥补，且健康的身体是农民工正常工作并获得收入的必要条件，失去健康的农民工将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因此，健康的损耗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也比较高。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率为10.02%，与健康贡献率处于相当水平。超时劳动损害农民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加速其身体的损耗，透支该群体的健康，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户籍歧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率为9.48%，略低于超时劳动。户籍歧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降低了农民工的获得感，在心理上加剧了农民工的社会隔离感、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这些因素损害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人口统计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贡献相对偏低，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及民族对幸福感的总贡献占比为12.52%，这表明个体特征并非农民工幸福感的核心决定因素。

以上分析表明，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状况、健康状况、劳动强度和户籍歧视这4个方面。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健康状况的恶化、劳动强度的提升、户籍歧视的加重均会导致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

表 4 夏普利分解结果及分析

变量	夏普利值	贡献率(%)
超时劳动强度	0.0145	10.02
收入	0.0780	53.96
年龄	0.0014	0.98
年龄的平方	0.0014	0.98
性别	0.0074	5.11
民族	0.0007	0.46
婚姻状况	0.0023	1.59
健康状况	0.0203	14.02
教育年限	0.0049	3.39
户籍歧视	0.0137	9.48
总计	0.1446	100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 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一) 内生性讨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产生了负向影响，且同时满足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但受制于数据特征，估计中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问题。例如，超时劳动能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但某些农民工可能认识到超时劳动对自身幸福感的负效应，拒绝接受超时劳动，并将工作时间控制在适度劳动范围内，这将产生自选择问题。为降低选择偏差以及潜在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对自选择问题进行处理。

倾向得分匹配法通过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构建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反事实框架。PSM 分析估计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计算样本的倾向得分值，常采用 Logit 回归方法根据一组协变量预测样本的倾向得分；第二步是以倾向得分值作为匹配关键指标，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进行匹配；最后根据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农民工超时劳动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需要说明的是，常见的匹配方法有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为增强研究的可信性，本研究汇报四种匹配方法下的估计结果。

本研究中，以超时劳动（周工作时长在 44 小时以上）的农民工样本为实验组，适度劳动（周工作时长在 44 小时及以下）的农民工样本作为对照组，处理指示变量为农民工是否超时劳动。近邻匹配（ $k=4$ ）法下的平衡检验结果显示^①，样本匹配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比较高，匹配完成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下降到 10% 以下，表明在匹配完成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大部分协变量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但匹配完成之后，大多数协变量的差异变得不再显著。PSM 方法降低了两组样本在协变量上的系统性差异，取得良好的匹配效果^②。

PSM 法估计结果见表 5。分析可知，在四种匹配方法下，超时劳动均对农民工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且均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不同方法下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的大小略有差距，但差异较小，表明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近邻匹配法的 ATT 值为 -2.5586，表明在依据是否超时劳动作为处理指示变量对适度劳动组和超时劳动组进行匹配后，超时劳动组的幸福感比适度劳动组显著降低 2.5586 个单位。在对自选择问题做出处理之后，所得结论仍然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5 PSM 分析结果及分析

匹配方法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ATT	-2.5586 *** (0.6844)	-2.4965 *** (0.6384)	-2.6594 *** (0.6275)	-2.7020 *** (0.84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处理组	1169	1169	1169	1169
对照组	2262	2262	2262	2262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汇报的是标准误；ATT 表示平均处理效应；近邻匹配的 Caliper 设置为 0.01，半径匹配的半径设置为 0.01，核匹配与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均使用默认的核函数与带宽。

资料来源：根据 2016—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① 限于篇幅，平衡性检验结果不在文中汇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② 其他三种匹配方法的平衡性检验结果类似。囿于文章篇幅，未在文中汇报。如有需求，可向作者索要。

(二) 稳健性检验

上文采用超时劳动强度这个连续变量反映农民工超时劳动的严重程度。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并与已有研究形成对照，将超时劳动处理为超时劳动层次 (*Overwork*)，估计超时劳动层次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上述处理能达到以下三个目的：第一，考察不同层级的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第二，可以与前人的研究做对比分析；第三，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替换法再次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见表 6。

分析表 6 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随着超时劳动层次的上升，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也逐渐增大。从全样本来看，相对适度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轻度超时劳动将导致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1.9311 单位，中度超时劳动将导致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4.2572 单位，重度超时劳动导致农民工的幸福感下降 4.9058 单位。可以发现，超时劳动强度并非均质地引发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中度超时劳动相对轻度超时劳动而言，造成幸福感的大幅度下降。中度和重度超时劳动对幸福感影响强度之间的差异较小。这表明随着超时劳动层次的上升，超时劳动对幸福感影响的强度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超时劳动层次对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在代际间也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有两种表现。第一，在各个超时劳动的层次上，超时劳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基于 SUR 模型执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中度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对两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强度的差异显著。第二，中度和重度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比较接近，重度超时劳动相对中度超时劳动而言并没有进一步降低老一代农民工的幸福感，但超时劳动层次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单调上升的消极影响。以上分析再次证实上文分析的核心结论，也证实了超时劳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强度的代际异质性。

表 6 超时劳动层次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因变量：幸福感		
	(1)	(2)	(3)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超时劳动层次 = 2	-1.9311 *** (0.6559)	-1.8864 * (1.0203)	-2.0091 ** (0.8639)
超时劳动层次 = 3	-4.2572 *** (0.6963)	-2.9958 *** (1.0379)	-5.3477 *** (0.9549)

续表

	因变量：幸福感		
	(1)	(2)	(3)
	全样本	老一代	新生代
超时劳动层次 = 4	-4.9058 *** (0.6408)	-2.9140 *** (0.8963)	-7.4149 *** (0.94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54.9036 *** (7.9208)	-13.1542 (21.9199)	-56.0785 *** (14.7610)
调整后 R ²	0.1433	0.1495	0.1437
F	45.6766	23.6134	25.3884
样本量	3431	1597	1834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将出生于 1980 年以前的受访者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将出生于 1980 年及以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定义农民工周工作时间在 44 小时及以下、45~50 小时、51~60 小时、61 小时及以上为适度劳动、轻度超时劳动、中度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分别赋值为 1~4，以适度劳动作为基准组。

资料来源：根据 2016-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上文估计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效应。接下来，基于结构性视角，实证分析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分别估计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健康、工作、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7。分析可知，超时劳动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强度最高，其次是收入满意度，再次是生活满意度，对健康满意度的影响最低。由此可见，超时劳动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

该实证结果有以下几点含义。首先，超时劳动加重农民工的工作强度，损害农民工的身体机能和心理健康，提高工伤事故的发生率，直接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其次，农民工常就职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不容乐观，基本的劳动权益常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农民工超时劳动经常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即便得到额外的加班收入，但这些收入不足以弥补加班造成的福利损失，从而超时劳动导致农民工对自身收入的满意度下降。再次，超时劳动剥夺农民工的部分日常生活时间，挤压了其原本可以用于休闲娱乐、接受教育或培训等活动的时间，导致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下降。最后，尽管从实证结果看，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健康满意度的负向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并不能得出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健康影响较小的结论，这反而凸显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健康的

正向选择效应，那些年轻力壮、身体健康的农民工才更可能外出务工。

短期来看，超时劳动对其健康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但长期超负荷劳动的损耗效应会持续累积，侵蚀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老一代农民工在青壮年时期进城务工，将青春、健康和汗水留在城市，在年龄稍大时就不得不拖着年老和疾病返回家乡，这在该群体中是常见的现象。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城市化是畸形的、危险的，将对城市和乡村产生双重危害，强化城乡间的区隔，阻碍城乡融合发展。

表 7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各维度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1)	(2)	(3)	(4)
	健康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收入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超时劳动强度	-0.0398 (0.0354)	-0.3557 *** (0.0390)	-0.3096 *** (0.0393)	-0.2502 *** (0.03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8029 *** (0.3654)	-1.7708 *** (0.3827)	-3.0748 *** (0.3988)	0.3228 (0.3937)
调整后 R ²	0.0760	0.1294	0.1473	0.0629
F	20.9120	52.6562	57.2814	24.9121
样本量	3431	3431	3431	3431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 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 机制分析

上文考察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体影响和结构性影响，证实了超时劳动导致农民工幸福感的恶化。但超时劳动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比有多高，均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采用 Baron & Kenny (1986)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建立如下模型，如公式 (2) ~ (4) 所示。其中， Sub_{ij} 为因变量，表示农民工的幸福感； $Workden_{ij}$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强度； M_{ij} 是中介变量，分别采用农民工教育及娱乐支出 ($Eduexp$) 与城市化融入 ($Urbanization$) 作为中介变量； $Controls_{ij}$ 为一组控制变量； Y_i 为年份虚拟变量； c 、 a 、 c' 和 b 为待估参数。若公式 (2) 中的系数 c 显著、公式 (3) 中的系数 a 显著、公式 (4) 中的 c' 和 b 均显著且 $c' < c$ ，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意味着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中部分通过影响中介变量发挥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的计算公式为 ab/c 。若 c 、 a 和 b 均显著，但 c' 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超时劳动完全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农民工的幸福感。

$$Sub_{ij} = \alpha_0 + c \times Workden_{ij} + \mu \times Controls_{ij} + Y_i + \varepsilon_{ij} \quad (2)$$

$$M_{ij} = \beta_0 + a \times Workden_{ij} + \lambda \times Controls_{ij} + Y_i + \nu_{ij} \quad (3)$$

$$Sub_{ij} = \gamma_0 + c' \times Workden_{ij} + bM_{ij} + \eta \times Controls_{ij} + Y_i + \omega_{ij} \quad (4)$$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8。分析可知，模型（1）表明超时劳动强度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2）证实超时劳动会挤压农民工用于娱乐休闲、教育培训和文化消费上的支出。模型（3）表明在控制农民工的教育及娱乐消费支出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效应趋于减弱，也即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部分被农民工的娱乐休闲及教育投资的减少所吸收。计算得到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7.2039%，意味着有 7.2039% 的负效应是通过影响农民工教育投资及娱乐支出最终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Sobel 检验证实中介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

模型（4）表明超时劳动负向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水平，降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和市民化意愿，也削弱其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感。模型（5）表明在控制农民工城市化融入水平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趋于下降，表明超时劳动对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部分被城市化融入所吸收。计算得到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9.5274%，意味着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效应中有 9.5274% 是通过削弱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而产生作用的。相应的 Sobel 检验在 1% 水平上显著，证实城市化融入是超时劳动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渠道。

表 8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分析结果

	(1)	(2)	(3)	(4)	(5)
	幸福感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	幸福感	城市化融入	幸福感
超时劳动强度	-5.8495 *** (0.7502)	-0.3538 *** (0.0510)	-5.4281 *** (0.7509)	-7.4061 *** (1.4778)	-5.2922 *** (0.7443)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			1.1912 *** (0.2494)		
城市化融入					0.0752 *** (0.00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1)	(2)	(3)	(4)	(5)
	幸福感	教育及娱乐支出占比	幸福感	城市化融入	幸福感
常数项	-49.1967 ^{***} (7.9070)	1.0387 [*] (0.5692)	-50.4340 ^{***} (7.8698)	-52.1967 ^{***} (15.7556)	-45.2690 ^{***} (7.8490)
调整后 R ²	0.1421	0.0899	0.1482	0.0452	0.1611
F	54.5851	38.8985	53.5163	16.1293	59.9005
观测值个数	3431	3431	3431	3431	3431
中介效应占比(%)	7.2039			9.5274	
Sobel 检验	-3.9850 ^{***}			-4.2960 ^{***}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 2016 - 2018 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七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然而，超时劳动现象仍屡禁不止、屡见不鲜，在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普遍和严峻。超时劳动侵害了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危害，降低该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本研究基于 2016 - 2018 年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夏普利分解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研究表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强度每上升 1 单位，其幸福感将下降 5.8495 单位。机制分析表明，超时劳动通过降低农民工的教育与娱乐消费支出和城市融入水平间接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经济收入负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超时劳动如果能获得充分的经济补偿将有助于降低其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教育水平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超时劳动对高教育水平农民工幸福感的负效应更大。结构化分析显示，超时劳动造成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此外，超时劳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以上研究结论揭示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为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推动城乡融合的深度发展，对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升是降低超时劳动的内生动力。应该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和议价能力。职业技能训练有助于拓宽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在遭遇强制性超时劳动时拥有更广泛的职业选择范围。技能型农民工在单位劳动时间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迫于经济压力的超时劳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其次，要加大对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的保护力度，对用人单位形成有效监管，确保农民工享受法定休息休假权和加班补偿。2021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996”工作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①。用人单位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以耗损农民工的健康为代价获取自身利益。执法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主动监管，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要强制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正式合法的劳动合同，为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应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维护其劳动权益。

最后，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水平。要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参与率，缓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确保农民工与城镇工同工同酬。要通过实施多种措施，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张弛有度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感和幸福感。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迁移”转向“扎根式迁移”，提升农民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下、生活好。

^① 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的通知》，参见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laodongguanxi_/zcwj/202108/t20210825_421600.html。

参考文献:

- 陈刚(2013),《通货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以居民幸福感为度量衡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2期,第60-73页。
- 陈景华、陈姚、陈敏敏(2020),《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第108-126页。
- 程名望、华汉阳(2020),《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第46-61页。
- 程名望、史清华、潘烜(2012),《工作时间、业余生活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基于上海市1446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第47-52页。
- 董延芳、罗长福、付明辉(2018),《加班或不加班:农民工的选择还是别无选择》,《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第116-127页。
- 方聪龙、芮正云(2018),《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基于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第57-65页。
- 冯永琦、张天舒(2016),《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第5期,第60-69页。
- 郭凤鸣(2020),《农民工过度劳动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第5期,第98-112页。
- 郭凤鸣、张世伟(2020),《农民工过度劳动是“自愿选择”还是“无奈之举”?——基于过度劳动收入补偿的分析》,《劳动经济研究》第4期,第75-94页。
- 黄永明、何凌云(2013),《城市化、环境污染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第12期,第82-93页。
- 孔庆洋、赵杰、郭斌、李琼英(2014),《农民工加班意愿、劳动供给与人口红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13-122页。
- 冷晨昕、陈丹青、祝仲坤(2021),《加入工会能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吗——来自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财经科学》第1期,第105-117页。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82-102页。
- 刘璐宁、孟续铎(2018),《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背景下农民工超时工作问题探析》,《农

- 村经济》第7期，第121-128页。
- 卢海阳、杨龙、李宝值（2017），《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第57-71页。
- 罗俊峰、童玉芬（2016），《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第3期，第66-75页。
- 孟续铎、王欣（2014），《企业员工“过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推-拉”模型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3期，第92-100页。
- 钱文荣、张黎莉（2009），《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家庭式迁移至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农民工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第70-78页。
- 万广华、张彤进（2021），《机会不平等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世界经济》第5期，第203-228页。
- 王桂新、胡健（2015），《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人口学刊》第6期，第45-55页。
- 王静、王欣（2013），《进城农民工超时工作的成因与特征研究》，《统计研究》第10期，第111-112页。
- 王笑天、李爱梅、吴伟炯、孙海龙、熊冠星（2017），《工作时长真的不快乐吗？异质性视角下工作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第180-189页。
- 王欣、杨婧（2021），《过度劳动及其个体经济损失》，《人口与经济》第3期，第128-142页。
- 谢勇、史晓晨（2013），《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13-118页。
- 杨丽、孙之淳（2015），《基于熵值法的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经济问题》第3期，第115-119页。
- 袁方、史清华（2013），《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管理世界》第10期，第49-61页。
- 袁正、夏波（2012），《信任与幸福：基于WVS的中国微观数据》，《中国经济问题》第6期，第65-74页。
- 祝瑜晗、吕光明（2020），《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观福利效应考察》，《统计研究》第10期，第115-128页。

- Adkins, Cheryl & Sonya Premeaux (2012). Spending Time: The Impact of Hours Worked On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0 (2), 380 – 389.
- Baron, Reuben & David Kenny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6), 1173 – 1182.
- Bowles, Samuel & Yongjin Park (2005). Emulation, Inequality, and Work Hours: Was Thorsten Veblen Right? *The Economic Journal*, 115 (507), 397 – 412.
- Dolan, Paul, Tessa Peasgood & Mathew White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 (1), 94 – 122.
- Easterlin, Richard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David & Melvin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89 – 125.
- Easterlin, Richard (2003).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0 (19), 11176 – 11183.
- Frey, Bruno & Alois Stutzer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2), 402 – 435.
- Gao, Wenshu & Russell Smyth (2011). What Keeps China's Migrant Workers Going? Expectations and Happiness Among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6 (2), 163 – 182.
- Huang, Hongwei, Xue Xia, Wenxi Zhao, Xiaoqing Pan & Xiaoqiang Zhou (2021). Overwork, Job Embeddedness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Chinese Knowledge Worker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9 (3), 442 – 459.
- Ng, Thomas & Daniel Feldman (2008). Long Work Hours: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Meta-Analysis Data.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9 (7), 853 – 880.
- Xu, Yingjiang, Gang Chen, Xinqiang Han & Xiujuan Gao (2020). Overwork Death of Chinese Physicians Under High-Intensity Pressure, 2007 – 2018. *Iran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9 (12), 2251 – 2255.
- Zhan, Qilin, Xiaohui Zeng, Zhan-ao Wang & Xiuzhen Mu (2020). The Influence of Minimum Wage Regulation on Labor Income Share and Overwork: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33 (1), 1729 – 1749.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Overtime Work on the Happ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Liu Jind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from 2016 to 2018,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overtime work on the happ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mechanism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Shapley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is also verified by sub-sample analysi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substitution variabl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time work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happ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overtime labor on happiness is second only to income and health, with a contribution rate higher than 10 percent. By squeezing time spent in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overtime work reduces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to urban life and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Increase in income from overtime work mitigates the negative impact on happiness, and educ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negative effect. The effect of overtime work on the happiness of old generation and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s heterogeneous. Overall, alleviating overtime work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overtime work, migrant workers, happiness, citizenization, life satisfa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08, J15, J83

(责任编辑：西 贝)